

# 論敦煌文學中的善惠故事 ——以 S.3050V、S.4480V、S.3096 為主<sup>1</sup>

楊明璋\*

## 一、前言

王重民等人所編撰的《敦煌變文集》中，收錄有抄寫於 S.3050V 擬名為「不知名變文」的作品，之後，包括《敦煌變文集新書》、《敦煌變文校注》、《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等敦煌講唱文學彙編專書，亦同樣收錄了這篇的作品，此作品所敘即為佛本生故事——善惠，其中最重要的情節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借花獻佛」。其實，在敦煌文學裡，與善惠故事有關的作品，並不是只有這麼一個寫本。上述所列舉的各本敦煌變文彙編專書裡，還有二個文本與之相關，分別是抄寫於 S.4480V、S.3096 且均被擬題為「太子成道變文」者，卻一直未為學界所注意。再者，S.2204、S.126 的〈太子贊〉，雖非敦煌變文，也未出現有善惠之名，但據其陳述的內容，亦可推知當屬善惠之敘事，且與上述〈不知名變文〉、〈太子成道變文〉頗為近似，二者間的互文性應可一探，又此類作品其文本屬性與實際用途，我們也有必要做進一步的考察。

另外，P.2837 正面所抄擬名為「佛本行集經」者，該卷卷首雖已殘，但從第一行開始，至十三行所書，基本上也是善惠故事，雖然它稱善惠為童子，此卷內容確實和今《大正新脩大藏經》中的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近似，惟其敘事較為簡省，和 P.2303V 被擬名為「佛本行集經略抄」是同一類，應該都是以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為本所進行的略抄，敘寫創作的成分不大，故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又 P.2250 的唐神英〈嘆散花供養讚〉，其中雖出現有善惠之名，但缺乏故事性的情節，<sup>2</sup>故亦不列入本文討論。

<sup>1</sup> 本文初稿 2011 年 3 月 10 日於日本筑波大學「東亞宗教文獻國際研究集會」發表，廣島大學荒見泰史教授提供許多寶貴意見，特此誌謝。

\* 政治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sup>2</sup> 此作雖為唐釋神英的作品，但據 P.2250 知其已為南岳沙門法照編撰入《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

## 二、S.3050V、S.4480V、S.3096 三個寫本

### 所敘故事彼此的關係

S.3050V、S.4480V、S.3096 等三個寫本所敘之故事文本彼此間的關係，1972 年羅宗濤先生博士論文《敦煌講經變文研究》即曾提及此三寫本中的善惠故事原為一篇，<sup>3</sup>惜長久以來並未受到注意。羅師所持之理由有三：一，三個寫本的故事情節相接續，先是演述善惠受記，接著再演述釋迦牟尼本行。二，三個寫本的詞句相應，如 S.3050V 有「大富長者」一詞，S.3096 亦有之；又 S.3096 出現有「前劫婢女」一詞，正印證了 S.3096 一文本是相應於 S.3050V 予善惠七枝蓮花的婢女。三，三個寫本的筆跡似出自一人之手，如雪山、大富長者、善惠、世尊、是、年等詞語均有其獨特的個人書寫習慣，尤其是「是」、「年」二字是三個寫本均同時出現相同的書體。

這樣的論證大抵是可信的，像筆跡一項，筆者還可再舉數例，如「眾」字三個寫本的書體是一致的；「心」「園」二字 S.3050V、S.4480V 二寫本的書體也是一致的；「國」「家」二字則是 S.4480V、S.3096 二寫本的書體是一致的。當然，不可諱言的，其中也有值得商榷的，如「大富長者」一詞，羅師提到此詞於《敦煌變文集》中僅於抄寫在 S.3050V、S.3096 二寫本的文本中出現過，事實不然，像〈祇園因由記〉、〈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亦有之，而這二個文本所述和善惠並無任何干係，可見「大富長者」一詞只是有錢長者的泛稱，而非某一長者的專名，並不能做為 S.3096 與 S.3050V 二寫本所抄是相互銜接的文本之依據。倒是 S.4480V 與 S.3096 均出現有「十六大國」一詞，書體近同，又此詞雖亦見於他篇

行儀》卷下，卷首有題作「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卷下」，下署「南岳沙門法照撰」，又有序云：「其讚文行人總須誦取，令使精熟切不得臨時執本讀之，亦通大會作法事誦之。」又其與《大正新脩大藏經》「諸宗部」中的唐釋法照於上都章敬寺淨土院述《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歎散華供養讚〉大體相同。一開頭四句有提到善惠，云：「昔有仙人名善惠，一時買得五莖花。持將供養定光佛，因花果號釋迦尊。」之後則反覆述說散花供養佛的種種福報。參見《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7 冊 No.1983《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CBETA 電子佛典 V1.16 普及版。另可參李小榮《敦煌佛教音樂文學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70。

<sup>3</sup>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 年，頁 39-57。另外，2004 年王于飛亦針對此三寫本有過討論，云：「本卷（S.3096）變文書法與 S.4480〈太子成道變文〉（二）相同。其『十六大國』等字跡明顯出一轍，皆為張長繼所抄，審其文意，則（二）為前，（五）為後，前後相接，文意完整（除淨飯王問仙人一段外，或未入此文），似為一『太子成道』故事的縮略版。其行文簡約，與（三）、（四）大不相同。」又：「（S.3050）另行抄變文正文。起『昔時大雪山南面』，迄『兩辟支著一面與行』，41 行……。似為張長繼所抄。」見王于飛：《敦煌變文寫卷著錄》，四川大學古代文學博士後學位論文，2004 年，頁 75、118。

變文中，但此處之用法卻是獨有的，如〈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或北圖 8437、8438、8671 的〈八相變〉亦有之，以〈八相變〉為例，其中有「當日金團天子，潛身來下人間」，「遍看十六大國」的句子，此段的故事情節與 S.4480V 所述大抵相同，惟 S.4480V 所述於「十六大國」前多了「河西」一詞，且另外還提及「河東三百六十州」，有意識地利用此一情節對河東與河西進行了一抑一揚，同時，也使得此一源自佛典的故事，業已漢化，甚至是河西化了。S.3096 所述，雖未加上「河西」，而是作「於大街中結九重綵色樓子上坐，十六大國應有大富長者之女」，這是同樣有太子於綵樓上揀婚對情節的〈太子成道經〉或〈悉達太子修道因緣〉所沒有的。故我們可以說，S.3096 出現有「十六大國」一詞，正好說明了它與 S.4480V 所述的故事情節是暗合的。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S.4480V 所述文末已殘缺，對於判斷 S.3096 是否確能與之銜接，難免有些影響。再者，S.3096 所敘寫的故事甚為簡略，短短的十二行文字就包含了太子於綵樓揀婚對、與耶輸陀羅以指環相認、二人一起坐禪行道、父王不欲太子出家等故事情節，這和 S.3050V、S.4480V 所敘迥異。基於此，較為保守的說法是，S.3050V 與 S.4480V 所述的故事應是來自同一文本，而 S.3096 原則上也和上述二個寫本是相銜接的，只是它有點類似〈前漢劉家太子傳〉的情形，還不算是很有系統的完整文本，僅是個提綱、綱要而已。

### 三、S.3050V、S.4480V、S.3096 三個寫本

#### 所敘故事與佛典的關係

##### (一) S.3050V 所敘故事與佛典的關係

三個寫本中以 S.3050V 學界討論較多，研究者對其故事情節之出處，也就是以何佛典做為演繹的基礎，提出了許多的看法。1957 年彙校出版的《敦煌變文集》擬題作「不知名變文」，王慶菽校記並有云：「因不知演繹何經，姑擬今題。」<sup>4</sup> 對於其故事情節的出處顯然並不清楚。後來以《敦煌變文集》為本的諸多變文集校注彙編，如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也只是承其說而已，同樣名為「不知名

<sup>4</sup> 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年，頁 821。

變文」<sup>5</sup>，到黃征、張涌泉的《敦煌變文校注》雖亦名為「不知名變文」，但其校注有云：

本篇似演繹佛本生故事。後漢竺大力等譯的《修行本起經》卷上〈變現品〉、劉宋求那跋陀羅譯的《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一、隋闍那崛多譯的《佛本行集經》卷三〈受決定記品〉等佛典中都載有相同或相似的故事。<sup>6</sup>

而周紹良、張涌泉、黃征的《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則更進一步擬名為「善惠買花獻佛因緣」，並有說明云：

本卷斯三〇五〇號。首無題，卷末殘缺。內容為到王舍城募化金錢、舍勒等物以及買花獻佛的佛本生故事。《敦煌變文集》卷八收之，題作〈不知名變文〉。按此類故事在後漢竺大力等所譯《修行本起經》卷上〈變現品〉、劉宋求那跋陀羅所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一、隋闍那崛多所譯《佛本行集經》卷三〈受決定記品〉等佛典中俱有記載。今據原文主要內容擬題作《善惠買花獻佛因緣》。原文中間穿插一段建造祇樹給孤獨園的故事，當為俗講人所附益。<sup>7</sup>

其論述較《校注》所言更深入，不只是說明此文本與漢譯佛典的關係，且以文本中最重要的情節——善惠買花獻佛做為標題，另也為文本中溢出佛典所敘善惠故事者——建造祇樹給孤獨園的故事，做出了「俗講人所附益」的解釋。

其實，早注意到 S.3050V 所抄之故事文本與佛典善惠故事關係的是劉銘恕，其於〈敦煌遺書叢識〉一文，曾討論到 S.3050V 所抄之故事文本，並名之為「儒童本生變文」，有云：

《敦煌變文集》收錄了一篇斯 3050 號的失題變文（819-821 頁），編輯校注同志將其暫名之為「不知名變文」。余以佛教燃燈佛授記之古代石刻、繪畫，以及佛經經文，與此篇變文加以比較體會，知其故事確為釋迦於未成佛之前世，於那竭國城遇定光佛授記之事。惟變文前部間有錯亂，尤以「其大國給孤長者，心中大越（悅），偏（遍）佈施五百個童身」，至「捨財無數，名為給孤長者」一段為甚。蓋給孤獨長者為佛建立祇園精舍之故

<sup>5</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809。

<sup>6</sup>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1135。

<sup>7</sup> 周紹良、張涌泉、黃征《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1008。

事，與燃燈佛授記，絕不相干。試思作者所以誤會至此，大概係以不樓陀長者的供養釋迦前身之儒童一事，與給孤獨長者的供養成佛後之釋迦故事，混為一談所致。此與〈秋胡變文〉謂秋胡洞達九經三史、〈韓擒虎變文〉開頭說會昌毀佛，語言文字上的顛倒錯亂、時間上的前後矛盾情況，約略相似。講變文者所以名俗講，與此等現象，容亦有關。現在初步肯定這篇東西，就是「儒童本生變文」。儒童本生的故事，見於多種佛經，現在僅抄《修行本起經》卷上〈現變品第一〉的文字，以供參考比照。<sup>8</sup>

所論基本上與《輯校》相當，尤其是他也認為孤獨長者為佛建立祇園精舍之故事是俗講變文者的一種顛倒錯亂。惟劉氏擬名作「儒童本生變文」，可見他對此一文本文學體類之認定是有差距，這點還有待進一步討論；至於一取名作善惠，另一作儒童，則是他們依據的佛典不同所致，前者依《過去現在因果經》，後者據《修行本起經》，只是若細讀《修行本起經》，則恐怕不宜名為儒童本生，而應作「無垢光本生」，因為該佛典云：「是時有梵志儒童，名無垢光」，可見儒童一詞僅是用來說明此一梵志的年紀尚小，無垢光才是其名。

接著，周紹良有〈《敦煌變文集》所收敦煌卷子「善惠買花獻佛因緣」本事考〉一文，這是有關 S.3050V 所抄故事文本之討論，學界較為重視的一篇，據周氏的考論，買花獻佛的佛本生故事共有五個漢譯佛典有記載：最早見於後漢竺大力共康孟詳譯的《修行本起經》卷上〈現變品〉，其次是吳支謙譯《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三是西晉聶道真譯《異出菩薩本起經》，四是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一，五是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三〈受決定記品〉第二上，並解釋道：

綜觀以上本生故事，顯然是同一類型的故事，在不同時代演繹而成。……這個故事在敦煌卷子中也存有一本，藏倫敦大英圖書館編號斯三〇五〇，……細核其文辭，應是一篇俗講文之類作品，而其內容，實即上引五經所敘同一故事。……這篇俗講文，與《過去現在因果經》的主角善慧（惠）人名相同，事迹又與《佛本行集經》等相似，其中另加一段建造祇樹給孤獨園的故事。把釋迦牟尼過去的本緣和在世的行事合為一談，則是說俗講人的附會增益，借題發揮所增入。這一卷俗講文，應屬因緣一類的作品，《敦

<sup>8</sup> 劉銘恕〈敦煌遺書叢識〉收入敦煌文物研究所編《1983 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甘肅：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417-437。

煌遺目總目索引》所定名似不妥，從內容審之，並無雪山修道故事，應作〈善惠買花獻佛因緣〉為是。<sup>9</sup>

這樣的說法，也得到學界的認可，如《敦煌學大辭典》由柴劍虹所執筆的「善惠買花獻佛因緣」條即云：

一作〈善惠雪山修道文〉。因緣類作品。S.3050。此文敘述大雪山南面有一梵志婆羅門僧教學八萬徒弟，其中上座善惠四月八日到王舍大城發四弘願，後又到蓮花城中聽說燃燈佛出世，便向一婦人購得蓮花七支獻佛。善惠事跡與《佛本行集經》卷三〈受決定記品〉所述云弟子故事相似。又《過去現在因果經》中有善惠仙人買花獻佛故事，《修行本起經》卷上《現變品》、《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中亦有類似故事。但敦煌本語言更為簡潔通俗，口語化強，又附會增益了建造祇樹給孤獨園的故事，體現了說因緣的特色。<sup>10</sup>

事實上，於劉銘恕、周紹良之前，羅宗濤先生早於 1972 年對 S.3050V 所抄之故事文本與佛典善惠故事的關係有過詳細的討論，如周紹良提到，上一文本「與《過去現在因果經》的主角善慧（惠）人名相同，事迹又與《佛本行集經》等相似」，羅師亦已提及。<sup>11</sup>

綜觀以上眾家所論，大抵均指出此文本的素材來自漢譯佛典，特別是《佛本行集經》，所言甚是，惟論及文中有建造祇樹給孤獨園的故事是俗講者附會的結果，均有指摘之意。對此，筆者以為講述者並非無的放矢，此一文本的講述者應有參考劉宋求那跋陀羅譯的《過去現在因果經》，此經在敘述善惠故事之前，即有云：「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講述者或許即借此而發揮。此一議題羅師亦有過討論，除了同樣對講述者有指摘之意，以為是其淺陋所致，卻也有較為正面的說辭：一是認為善惠供養燃燈佛而受記，和給孤獨長者布施祇園及布濟貧民廢疾之事，二者性質頗為接近，或皆為講述者為邀布施而增入；二是認為講述者安排建造祇樹給孤獨園一故事情節，做為此一文本中善惠說法之內容，也是極為合理的。<sup>12</sup>筆者以為這樣的看法應該是較接近事實，在敦煌講唱文

<sup>9</sup> 周紹良〈《敦煌變文集》所收敦煌卷子「善惠買花獻佛因緣」本事考〉，收入《紹良文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2005 年，頁 1814-1826，「善惠買花獻佛因緣」條。

<sup>10</sup> 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 年，頁 581。

<sup>11</sup>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 年，頁 50、53-54。

<sup>12</sup>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 年，頁 52。

學裡，或有劉銘恕所說的「語言文字上的顛倒錯亂、時間上的前後矛盾情況」，但不能一概而論，以為這些講述者喜穿鑿附會、素養有限。基本上，得「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sup>13</sup>的佛家講唱，講述者對佛典的熟稔應是不在話下，且以此一文本並無太多的訛誤來推測，文中敘及建造祇樹給孤獨園理應不是無知所造成，而是有其目的與作用的。

## （二）S.4480V、S.3096 所敘故事與佛典的關係

相較於 S.3050V 所抄之故事文本，學界對 S.4480V、S.3096 所敘與佛典關係之著墨則有限。筆者目前所見，蓋以羅宗濤先生《敦煌講經變文研究》所論較為詳盡，羅師指出：S.4480V、S.3096 所敘的善惠以鹿皮衣鋪地及佛為之受記，於《太子瑞應本起經》、《現在過去因果經》、《佛本行集經》均可見與之相近的情節，而又以源於《佛本行集經》為多；護明菩薩使金團天子選擇託生之處，則僅見於《佛本行集經》；至於太子降誕、成親、遊觀四門、踰城出家、成道等情節，諸經均可見，惟成親時，太子取金指環予前刼婢女一事，僅見於《佛本行集經·捨術爭婚品》及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sup>14</sup>以上所言甚是，惟《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確有與指環相關的敘事，但並未見有太子取指環予耶輸陀羅之事。不過，這樣也正好說明了 S.4480V、S.3096 所敘與《佛本行集經》的淵源最深，蓋以之為主而加以演繹而成的。

另外，羅師還注意到護明菩薩入胎於摩耶夫人及釋迦牟尼降誕之年月日，以為文中提及「癸丑年之歲七月十五日夜」入胎，「蓋由甲寅上推十月而為言也，而七月十五日，蓋亦變文所增入者」<sup>15</sup>，此說有誤，據唐釋智昇撰《續集古今佛道論衡》、唐釋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一百所述，釋迦牟尼佛確於周昭王二十三年，即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託淨飯王宮摩耶夫人胎。<sup>16</sup>而於「丙寅之歲四月八日」誕下，羅師以為「丙寅」蓋為「甲寅」之誤，<sup>17</sup>羅師所說為是。有關釋迦牟尼佛入胎、誕下的時間，在敦煌文獻中也可見相關的記述，P.3600 有一則擬名為〈佛

<sup>13</sup> 梁·釋惠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522。

<sup>14</sup>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 年，頁 54-57。

<sup>15</sup>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 年，頁 55。

<sup>16</sup> 以上分見《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2 冊 No.2015《續集古今佛道論衡》、第 53 冊 No.2122《法苑珠林》，CBETA 電子佛典 V1.16 普及版。

<sup>17</sup>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 年，頁 55。

八相成道紀年」<sup>18</sup>者，云：「佛周昭王廿三年癸丑歲七月十五日夜子時，降摩耶夫人，至昭王廿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子時於藍毗尼園而生，……以上依《周書異記》及《辯正論》說也。」此例也正好說明了 S.3050V、S.4480V、S.3096 所敘故事文本之講述者誤將「甲寅」作「丙寅」，但其對於佛教大小典故還是有一定的素養，才能信手拈來地將來自不同佛典的故事情節捏合在一塊。

## 四、S.3050V、S.4480V、S.3096 三個寫本 所敘故事的文本屬性

S.3050V 所抄之故事文本，學界一開始不知演繹自何佛典，故擬名為「不知名變文」，之後或作「善惠買花獻佛因緣」，或作「儒童本生變文」，或作「善惠雪山修道文」。而 S.4480V 所抄之故事文本，《敦煌變文集》則擬題作「太子成道變文」，王慶菽並有校記云：「本卷編號為斯四四八〇，標題原缺，今據故事內容擬題。」<sup>19</sup>之後，包括《敦煌變文集新書》、《敦煌變文校注》均承此，亦名為「太子成道變文（二）」<sup>20</sup>，而《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則擬名為「八相變（四）」<sup>21</sup>。至於 S.3096 所抄，《敦煌變文集》擬題作「太子成道變文」，王慶菽校記則云：「本卷編號為斯三〇九六，標題原缺，今據故事內容擬題。」<sup>22</sup>《敦煌變文集新書》、《敦煌變文校注》等均亦承此，名為「太子成道變文（五）」<sup>23</sup>，而《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則擬名為「八相變（七）」<sup>24</sup>。

S.4480V 所抄之故事文本，其中的金團天子下人間遍看十六大國之情節，確實和北圖 8437、8671 的〈八相變〉所述大抵相同。金團天子情節之後的太子降誕情節，則又與抄於 P.2999 等寫本的〈太子成道經〉近同。是故，研究者才擬

<sup>18</sup>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所擬。

<sup>19</sup> 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年，頁 321。

<sup>20</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61；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486。

<sup>21</sup> 周紹良、張涌泉、黃征《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677。

<sup>22</sup> 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年，頁 327。

<sup>23</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73；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498。

<sup>24</sup> 周紹良、張涌泉、黃征《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687。

名或作「八相變」，或作「太子成道變文」。惟此文本一開始敘述的是善惠爲世尊脫鹿皮之衣鋪地、解髮爲藉而佛爲之受記，這是接續 S.3050V 善惠借花獻佛的故事情節，並未見於其他的敦煌講唱文學作品裡；又此卷故事文本最末的姨母撫育，亦不見於其他的敦煌講唱文學作品。

至於 S.3096V 所述，則有太子與前劫婢女成親、太子遊觀四門、太子踰城出家、太子成道等情節，這些情節大抵亦可見於〈太子成道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八相變〉等講唱文學作品中的，故研究者也才會擬名作「太子成道變文」或「八相變」。

綜此，不論是「善惠買花獻佛因緣」、「儒童本生變文」、「無垢光本生變文」、「善惠雪山修道文」，或者是「太子成道變文」、「八相變」，都無法將 S.3050V、S.4480V、S.3096 所敘故事文本完整地含括進來，前四個擬名只能標明 S.3050V 及 S.4480V 前半部之故事文本，而後二個擬名則又僅表述 S.4480V 的後半部及 S.3096 之故事文本。既然如此，爲了讓整個故事能有一個足以含蓋全文的題名，恐怕得另闢蹊徑。荒見泰史〈漢文譬喻經典及其綱要本的作用〉<sup>25</sup>一文提到敦煌文獻裡發現了不少摘要譬喻故事的綱要本，其中有一類是《佛本行集經》的抄錄，包括 P.2303V 擬名爲《佛本行集經略抄》、P.2837 擬名爲《佛本行集經》、<sup>26</sup> P.3317 〈佛本行集經第三卷已下緣起簡子目號〉，對我們在理解 S.3050V、S.4480V、S.3096 所敘的故事文本之屬性及其命名標題，是很有啓示意義的。前文我們曾說，S.3050V、S.4480V、S.3096 所敘故事文本蓋以《佛本行集經》爲主而加以演繹而成的，而在敦煌文獻中，抄錄有《佛本行集經》的寫本約近三十個，<sup>27</sup>荒見泰史所注意到的 P.2303V 擬名爲《佛本行集經略抄》、P.2837 擬名爲《佛本行集經》、P.3317 〈佛本行集經第三卷已下緣起簡子目號〉等，則爲節錄本、綱要本，其中又以 P.3317 〈佛本行集經第三卷已下緣起簡子目號〉對我們在理解 S.3050V、S.4480V、S.3096 所敘的故事文本是很有幫助的。P.3317 所羅列者，均爲《佛本行集經》的情節關目，以「一蓮華城降怨王處」爲起首，終於「十八靈山說法處」，共有一百一十八則，其中正好有十六則與善惠故事有關，包括：「四蓮華城雪山南珍寶梵處」、「五雲童子從雪山下至輸羅波城處」、「六童子答彼城人

<sup>25</sup> 荒見泰史〈漢文譬喻經典及其綱要本的作用〉，陳允吉主編《佛經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271-290。

<sup>26</sup> 以上擬名均出自《法藏敦煌西域文獻》。

<sup>27</sup> 據《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頁 54。

說師名號處」、「七婆羅門女善枝樓上遙望處」、「八雲童子論議勝得財處」、「九雲童子賣（買）華處」、「十降怨王迎佛入城處」、「十一降怨王令嚴飾街坊處」、「十二降怨王散花處」、「十三雲童子散華處」、「十四眾人脫衣鋪地處」、「十五佛化泥雲童子鋪髮處」、「十六然燈佛與雲童子受記處」、「十七騰身空中見十方佛處」、「十八雲童子求得出家處」、「十九十方天眾爭髮處」，大抵對應於今本《佛本行集經·受決定記品》的內容，同時，也和 S.3050V、S.4480V、S.3096 所敘的故事文本之前半段大體相應。至於此一文本的後半段敘事，本就十分簡略，一個關目情節往往三言兩語即帶過，故 P.3317 〈佛本行集經第三卷已下緣起簡子目號〉於「十九十方天眾爭髮處」之後，如「廿七護明菩薩迦葉處命終上生兜率處」、「廿八護明從天降下凡間處」，或「七十二東門老處」、「七十三南門見病處」、「七十四西門見死處」、「七十五北門見僧處」，S.3050V、S.4480V、S.3096 所敘的故事文本之後半段，亦有涉及。故筆者以爲，S.3050V、S.4480V、S.3096 所敘的故事文本應可依「佛本行集經」擬題，至於它應該是屬何種文學體類，則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

由於學界對 S.3050V、S.4480V、S.3096 所敘的故事文本，多僅將焦點放在 S.3050V 所述，或以爲它是變文，或作因緣，或作因緣記、因由記，歧異頗大，但基本上都認爲它和俗講有密切的關係，是俗講文的一種。而連同 S.4480V、S.3096 一併論述的，如白化文，有云：

《敦煌變文集》中有一些明顯地可算作俗講類型的片斷，尚可研究一番。  
例如，卷四中的 S.4480、S.4128、S.4633、S.3096 等號，均缺乏前述變文和俗講的各自的特點。敘述故事，前後呈電影鏡頭剪接跳躍式。鄙見是，此類可能是僧人聽俗講，甚至是聽正規講經時的筆記。但沒有直接確證，猜測而已。<sup>28</sup>

確如白氏所言，S.4480V、S.3096 在敘述故事時，甚是簡略、跳躍，相較之下，S.3050V 詳細、精彩多了，但仍被認爲是與俗講相關的片斷紀錄。

而對 S.3050V、S.4480V、S.3096 有較爲全面觀照的是羅宗濤先生。其於《敦煌講經變文研究》「第六章餘論」，將 S.3050V、S.4480V、S.3096 所抄故事文本與〈祇園因由記〉、S.4128 的〈太子成道變文〉、S.4633 的〈太子成道變文〉等

<sup>28</sup> 白化文〈從圓珍述及俗講的兩段文字說起——紀念周太初（一良）先生〉，《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2002 年，頁 4-8。

一併名為「因由記」，並歸納出這一類文本的特點有三：

俱但有說白而無吟詞，與講經文、變文之講唱錯出者異，此其一；其內容俱切近佛經，而又俱較佛經簡略，與講經文之多所誇飾，變文任意增刪、排比者異，此其二；其文筆均拙劣不堪、訛誤忒甚，講經文、變文中任何一篇，均遠優於此，此其三。<sup>29</sup>

其說甚為翔實，S.3050V、S.4480V、S.3096 所抄故事文本與一般變文、講經文的差異確實頗大，特別是前者僅有散說，後者韻散相間。至於此一文本是否可歸屬於因由記，抑或當作因緣、因緣記，則仍有待進一步考論。我們歸納敦煌文學中原就標示有「因緣」、「緣」、「緣起」及「因緣記」、「因由記」的文本，將發現「因緣」、「緣」、「緣起」等與「因緣記」是不大一樣的，而「因由記」和「因緣記」也是有所差別的。敦煌文學中所見名為「因緣」的文本，基本上與變文、講經文是一樣的，也是具有韻散相間的形式，和 S.3050V、S.4480V、S.3096 的形式相距甚遠。倒是與名為「因緣記」、「因由記」的文本較為接近，因為它們同是以散句來敘事，不見有講說、吟唱的口吻或提示語。柴劍虹於《敦煌學大辭典》「因緣記」條就提到：

一作因由記。唐代敘述因緣的傳記文。敦煌遺書中保存的因緣記作品有〈祇園因由記〉(P.2344、3784)、〈佛圖澄和尚因緣記〉(S.1625、P.2680 等)、〈劉薩訶和尚因緣記〉(P.2680、3570 等)、〈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P.2680、3570 等)、〈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S.276、528，P.2680、3570 等)及〈遠公和尚緣起〉(P.2680)、〈善惠雪山修道文〉(S.3050)。它們或擷取佛經故事，或逕取某個高僧的傳記，照本宣科或略有渲染，以闡明因果，宣揚積善求福。這些作品似是當時寺院配合俗講用的純散文作品，一般篇幅短小，講究文采，書面性強，有的係用駢文寫成，有的頗具故事情節和傳奇色彩。它們不僅與佛經典籍及《高僧傳》等傳記文學有著密切聯繫，而且與當時寺院的說因緣之風密不可分，為唐五代寺院俗講增添了更多接近民間的、與僧侶及廣大民眾現實更貼近的宣傳材料，既豐富與發展了因緣類文學形式，也對宋元以後講唱伎藝、話本小說、戲劇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sup>30</sup>

<sup>29</sup>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 年，頁 485-486。

<sup>30</sup> 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 年，頁 523-524，「因緣記」條。

雖然他僅論及 S.3050V 所抄的善惠故事，但由此可知，它將類似 S.3050V 這樣的故事文本歸於因由記、因緣記。只是，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敦煌文獻中原本名為因由記與因緣記者，二者還是有所差異的。〈祇園因由記〉(P.2344、P.3784)<sup>31</sup>與〈佛說諸經雜緣喻因由記〉(P.3849V、BD03129) 敘述的分別為給孤獨長者為佛備置精舍的因由始末及十一則因緣業報的釋教故事，且前者內文有「言祇樹者，有其因由」，後者的每一則故事則大致上是以「其由如是」做結。至於原卷標明為「因緣記」者，計有 S.276 的〈靈州史和尚因緣記〉，S.528 的〈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P.2680 的〈劉薩訶和尚因緣記〉、〈佛圖澄和尚因緣記〉、〈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P.3570 的〈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劉薩訶和尚因緣記〉，以及 P.3727 的〈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劉薩訶和尚因緣記〉，綜言之，目前在敦煌文獻中所見名為「因緣記」者，有〈靈州史和尚因緣記〉、〈劉薩訶和尚因緣記〉、〈佛圖澄和尚因緣記〉、〈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等四個篇章，它們共同的特點就是均敘述了高僧的奇異事蹟，顯然和名為「因由記」者不同。故羅師將 S.3050V、S.4480V、S.3096 所抄故事文本歸於因由記，應是可行的。

另外，還有一點我們有必要做進一步的說明，即「因由記」縱然與「變文」、「因緣」一類典型的韻散相間的講唱文學不大相同，但我們也無法將之與講唱文學全然劃分開來。像〈祇園因由記〉縱然是全以散文來敘述，但用語習慣、敘事模式與講唱文學頗為近同，故歷來均將之收入敦煌變文彙編。與之類似的還有 Dx285 所抄敘述佛本生須大拏太子好施因緣故事與 S.3050V 所抄敘述佛本生善惠出家因緣故事，它們也都被收入敦煌變文彙編之中。當然，後者所抄並未完整，需再加上 S.4480V、S.3096 二寫本所抄，只是，此一文本後半段較為簡省的敘事與一般的講唱文學又不大相同。此一現象羅宗濤先生解釋云：

「因由記」一類文字，似當為俗講僧雜掇佛經中若干典故，以語體文記其大略，以為其聯綴之資料。<sup>32</sup>

<sup>31</sup> P.2344 首尾全，但無標題；P.3784 從「須達獨自入城」一句開始抄錄，潘重規先生謂其前有朱書一行作「祇園因由記頭座上黃帝內」，末句「速疾如此」下，又有朱筆大書「已上祇園畧記」六字，故此本可名為「祇園因由記」，也可稱作「祇園畧（圖）記」。由於是朱筆所書，黑白之圖版難以呈現，筆者檢視《英藏敦煌文獻》所錄，僅依稀辨出「已上祇園畧記」六字。參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663-664。

<sup>32</sup>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 年，頁 498。

至此，筆者以為，我們應可將 S.3050V、S.4480V、S.3096 所抄故事文本擬題作「佛本行集經因由記」，如 P.3849V、BD03129 二寫本的〈佛說諸經雜緣喻因由記〉一般。

## 五、S.3050V、S.4480V、S.3096 三個寫本的用途

S.3050V、S.4480V、S.3096 所抄之故事，就其文本的內容、形式來看，它們確實是可以上下相互銜接的，只是，此一文本之所以分抄於三個卷號，似乎與一般本為同一寫卷被割裂成數卷的情形不大一樣，羅師就說道：「其所以分為三篇之故，則並非寫卷之斷裂，乃抄錄者將其填充於各其他經卷空白處有以致之也。」<sup>33</sup>對此，筆者以為還有再做進一步討論的必要。

我們先將此三個寫卷寫錄的情形簡述如下：S.3050 正面抄《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背面抄錄本故事，正背面的書寫字跡不同。而 S.4480 正面抄寫〈賽天王〉，<sup>34</sup>背面抄錄本故事，惟正、背面書寫字跡不大相同。至於 S.3096 則是先抄釋法照〈淨土法身讚〉，<sup>35</sup>後接抄本故事至「四門觀」，背面繼續抄寫本故事，惟〈淨土法身讚〉與此文本的書寫字跡不大相同。基本上，這三個寫卷就寫本本身而言，應該是可以拼合在一塊的，也就是說，它們原本應是同一寫卷，只是其抄寫的文本內容無法連接在一塊。我們將三個寫卷拼合後的寫錄情形，羅列於後：

① S.3050V+S.4480V+S.3096

〈佛本行集經因由記〉+〈佛本行集經因由記〉+釋法照〈淨土法身讚〉、〈佛本行集經因由記〉（殘一小片）

② S.3096V+S.4480+S.3050

〈佛本行集經因由記〉+〈賽天王〉+《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

<sup>33</sup>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 年，頁 44。

<sup>34</sup> 〈賽天王〉和 P.3098 〈賽天王壹本〉、S.453 等六個寫本的〈天王文〉大抵相同，歧異較大者，蓋在祈願的對象，本卷與 P.3098 作「大宋聖主」，S.453 等六寫本則作「大漢聖主」或「大唐聖主」。此本《敦煌願文集》有校錄，見黃征、吳偉校注《敦煌願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95 年，頁 609-610。

<sup>35</sup> 此贊《大正新脩大藏經·古逸部》「敦煌寫本類」有錄文，見《大正新脩大藏經》第八十五冊 No.2827《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卷中·下》及 No.2828《大乘淨土讚》，CBETA 電子佛典 V1.16 普及版。另外，據研究其至少有十三個寫本，參張錫厚《全敦煌詩》，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年，頁 6069-6072；李小榮《敦煌佛教音樂文學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19-20。

同一文本未寫錄完畢，其間又穿插有〈淨土法身讚〉，最末又有〈賽天王〉及佛經，由於這些文本的書寫字跡不大一樣，或許就如羅師所言，蓋抄錄者充分利用經卷空白處所造成。但，筆者對於其中的〈佛本行集經因由記〉穿插有〈淨土法身讚〉，以為恐怕沒那麼單純，應有它的意義與作用。

這樣的想法，也不是筆者胡亂的發想，事實上早有學者也注意到了此一情形，像荒見泰史就曾提及：「考慮到（P.3096）正面〈大乘淨土讚〉記載，能夠推測該寫本的使用是在佛教儀式上。」<sup>36</sup>綜觀敦煌文獻中像這樣抄錄敘事文學作品的同時，也抄寫了讚文的例子還不少，如 S.4654 在抄錄〈舜子變〉前先寫錄了〈大乘淨土讚〉，也就是前述的〈淨土法身讚〉；P.3697 也是在抄錄〈捉季布傳文〉前寫錄了〈大乘淨土讚〉；P.3645 則是在抄錄完〈前漢劉家太子傳〉、〈季布詩詠〉後寫錄有〈佛母讚文〉。<sup>37</sup>準此，筆者遂以為像〈佛本行集經因由記〉、〈舜子變〉、〈捉季布傳文〉、〈前漢劉家太子傳〉、〈季布詩詠〉等敘事文學作品與讚文合抄在一塊，絕非偶然，而是有其意義與作用的。存有 S.4417、P.3849V 兩個寫本的俗講儀式流程，其中所記述的俗講儀節，正好可用來說明敘事文學作品為何常與讚文抄寫在一塊，該流程云：

夫為俗講，先作梵了，次念菩薩兩聲，說押坐了，索唱《溫室經》，法師唱釋經題了，念佛一聲了，便說開經了，便說莊嚴了，念佛一聲，便一一說其經題字了，便說經本文了，便說十波羅蜜等了，便念佛贊了，便發願了，便又念佛一會了，便迴向發願取散云云，已後便開《維摩經》。

夫為受齋，先啟告請諸佛了，便道一文，表嘆使主了，便說讚戒等七門事科了，便說八戒了，便發願施主了，便結緣念佛了，迴向發願取散。

講《維摩》，先作梵，次念觀世音菩薩三兩聲，便說押坐了，便索唱經文了，唱曰法師自說經題了，便說開讚了，便莊嚴了，便念佛一兩聲了，法師科三分經文了，念佛一兩聲，便一一說其經題名字了，便入經說緣喻了，便說念佛讚了，便施主各各發願了，便迴向發願取散。<sup>38</sup>

<sup>36</sup> 荒見泰史〈敦煌的故事綱要本〉，收入張涌泉等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漢語史學報·第三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326-347。

<sup>37</sup> 另外，根據荒見泰史《敦煌變文寫本研究》一書，還可找到三條佐證的資料：一是 S.5892 〈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後頭有〈辭娘讚文〉，二是 P.3213 〈伍子胥變文〉後頭有〈釋子讚頌文〉，三是北圖 8719 〈目連變文〉前抄了追悼文。見荒見泰史《敦煌變文寫本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114-183。

<sup>38</sup> 此引文蓋以 S.4417 為底本，參酌 P.3849，重新予以錄校。見楊明璋《敦煌文學與中國古代的

文末提到「便入經說緣喻了，便說念佛讚了，便施主各各發願了」，所謂的「緣喻」大概就像 S.3050V、S.4480V、S.3096 所抄以善惠借花獻佛為主軸的故事，而「佛讚」則如〈淨土法身讚〉，至於「施主各各發願」則大概就像〈賽天王〉這一類的願文。故縱然 S.3050V+S.4480V+S.3096 中的〈佛本行集經因由記〉與〈淨土法身讚〉、〈賽天王〉的字跡不大一樣，但它們之所以會被湊合在一塊，應也是為了便於在俗講儀式中來運用。

另外，還有一則頗值得注意的文本，是 S.126、S.2204 的〈太子讚〉，此一文本所敘基本上和 S.3050V、S.4480V、S.3096 所敘故事大抵是一樣的。為便於討論，茲先行將它錄於後：<sup>39</sup>

太子讚 釋迦牟尼佛和

聽說牟尼佛，初學修道時，歸宮啟告父王知，道我證無為。

太子初學道，曾作忍辱仙<sup>40</sup>，五百外道廣遮攔，修道經幾年。

金錢不自用，買花獻佛前，瓶中湧出五枝蓮，仙人生喜歡。

阿監<sup>41</sup>從城出，仙人遠近前，買花設誓捨金錢，願得宿因緣。

將花供養佛，兩枝在肘邊，光明毫相照諸天，法雨潤心田。

好道變泥水，如來湧<sup>42</sup>泥泉，布髮掩泥不將難，受記結因緣。

太子生七日，摩耶却歸天，姨母收養經七年，六藝有三端。

恩養親生子，七歲成文章，六藝周備體無常，生死難知當。

婚娶年十八，嬪妃與耶輸，更加子女二千餘，美貌世間無。

太子無心意，笙歌不樂歡，雖留娛樂意忡忡，只<sup>43</sup>欲遊四門。

東門見老病，南門見患人，西門見死醜形容，北門見真僧。

袈裟常掛體，瓶鉢鎮隨身，常念彌陀轉法輪，救度世間人。

譜隱傳統》，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1 年，頁 347。

<sup>39</sup> 此讚以《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為底本，另參校原卷及《敦煌韻文集》、《敦煌歌辭總編》、《全敦煌詩》。見《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一卷，頁 196-197；《敦煌韻文集》，高雄：佛教文化服務處，1965 年，頁 63-64；《敦煌歌辭總編》，頁 800-802；張錫厚《全敦煌詩》，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年，頁 6693-6696。

<sup>40</sup> 仙，原卷及《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作「賢」，據《敦煌韻文集》改。

<sup>41</sup> 以上文字，S.126 殘，題名亦未見，茲以 S.2204 為據。

<sup>42</sup> 湧，《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作「讚」，二寫本均作「湧」，改。

<sup>43</sup> 只，《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作「祇」，二寫本均作「只」，改。

作凡來下界，太子乘朱駒，宮人美女一叢叢，太子出凡籠。  
 耶輸焚香火，太子設誓言，三世共汝結姻緣，偕我入雪山。  
 不念買花日，奉獻釋迦前，買花設誓捨金錢，言約過百年。  
 作女如花捺，百國大王求，誓共太子守千秋，同姓亦同丘。  
 雪山成正覺，教我沒依頭，看花腸<sup>44</sup>斷淚交流，榮華一世休。  
 車匿別太子，來時行匆匆，耶輸雙手抱朱駒，聖凡何處居。  
 車匿報耶輸，太子雪山居，路遠人稀<sup>45</sup>煙火無，修道甚清虛。  
 寂靜青山好，猛獸共同緣，礎層石閣與天連，藤蘿遶四邊。  
 孤山高萬仞，雪嶺不曾<sup>46</sup>消，寒多樹葉玉成條，太子樂逍遙。  
 雪山嵯峨峻，峻嶒石壁重重近天河<sup>47</sup>，峻<sup>48</sup>沒人過。  
 千年舊雪在，溪谷又冰<sup>49</sup>多，菓木礎磧<sup>50</sup>掛綺羅，石壁峻<sup>51</sup>嵯峨。  
 雪嶺南面峻，太子坐盤陀，六賊翻作六波羅，修道苦行多。  
 只<sup>52</sup>見飛蟲過，夜叉萬餘多，石壁斑點錦紋窠，樹動吹法螺。  
 嶺上煙雲起，傘蓋覆山坡，彩畫石壁那人何，太子出娑婆。  
 唯留三乘教，悟者向心求。但行如是捨凡流，成佛是因由。

張錫厚於《敦煌學大辭典》「太子贊」條有云：「句式皆為五五七五，內容為贊頌太子修道成佛的故事。……全篇皆以通俗語句作贊，明白易懂。」<sup>53</sup>全篇確如張氏所言，贊頌的是太子修道成佛的故事，其中，從「太子初學道，曾作忍辱仙」到「受記結因緣」，雖未提到善惠之名，但它所敘述的其實就是善惠借花獻佛的故事。而從「太子生七日，摩耶却歸天」至「誓共太子守千秋，同姓亦同丘」，講的則是太子降誕、姨母撫育、太子成親、遊觀四門等佛傳故事。這些都可在

<sup>44</sup> 腸，原卷及《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作「腹」，據《敦煌韻文集》改。

<sup>45</sup> 稀，原卷及《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作「希」，據《全敦煌詩》改。

<sup>46</sup> 曾，原卷均如是，《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改作「層」。

<sup>47</sup> 此句如《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所言：「此句不合格律，似當補三字。」

<sup>48</sup> 嶮，原卷均如是，《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作「險」，誤。

<sup>49</sup> 冰，S.2204 作「氷」，即「冰」字，S.126 則作「水」，據文意言，當以「冰」為勝，茲據《敦煌韻文集》改。

<sup>50</sup> 磎磧，原卷均作「礎磧」，《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作「礎曾」，誤，應改作「礎磧」。

<sup>51</sup> 嶮，原卷均如是，《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改作「險」。

<sup>52</sup> 只，《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作「祇」，二寫本均作「只」，改。

<sup>53</sup> 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 年，頁 544，「太子贊」條。

S.3050V、S.4480V、S.3096 的〈佛本行集經因由記〉見到。〈太子讚〉與〈佛本行集經因由記〉差異較大的是：〈太子讚〉在敘述太子至雪山修道甚為詳細，〈佛本行集經因由記〉則僅三言兩語即帶過；還有就是〈佛本行集經因由記〉有護明菩薩使金團天子選擇託生之處、太子踰城出家、太子取金指環予耶輸陀羅，但〈太子讚〉則未述及。大抵而言，〈太子讚〉應該也是以《佛本行集經》為本所撰述而成的。而抄錄有〈太子讚〉的 S.126、S.2204 二個寫本裡，其中的 S.2204 一本又正好與一般擬名為〈董永變文〉的講唱文學作品寫錄一塊，先是抄寫了〈董永變文〉，接著是〈太子讚〉、〈十無常〉、〈父母恩重讚〉、〈十勸鉢禪關〉等贊頌文，且首尾的字跡是一樣的；至於 S.126 一本，或許在〈太子讚〉之前未見有任何講唱故事文本，但其後同樣也是抄了〈十無常〉與〈父母恩重讚〉，加上此一寫本首尾已殘，很難斷言它原本在〈太子讚〉之前是沒有講唱故事文本的寫錄。我們可以說，〈太子讚〉的寫錄情形，再次證明了講唱故事文本與讚文合抄在一塊絕非偶然，它表示了講唱故事文本與佛教俗講儀式是有密切的關係。

## 六、結論

經過上述的討論，基本上我們可以說 S.3050V、S.4480V、S.3096 等三個寫本所敘述的故事，應是出自同一文本，因為就故事情節而言，它們是上下相互銜接的；就使用的詞句來看，也有相應的痕跡，如 S.4480V 與 S.3096 的「十六大國」，S.3096 的「前劫婢女」也相應於 S.3050V 予善惠七枝蓮花的婢女；以及三個寫本的書寫字跡近同，意味著應是同一人所抄錄的。

而此一分抄於 S.3050 V、S.4480 V、S.3096 等三個寫本的故事，是以佛本生故事——善惠借花獻佛為基調，並進而敘及佛傳故事，其中的情節在許多的佛典中均可見，只是，與《佛本行集經》的淵源最深，蓋以之為主加以演繹而成的，當然，應該也參酌了像《過去現在因果經》、《周書異記》等相關典籍，或許其間有些疏失、未臻完整，但也絕非淺陋之人所能為的。而 S.3050 V、S.4480 V、S.3096 所敘故事的文本屬性，因其與〈祇園因由記〉、〈佛說諸經雜緣喻因由記〉等原本就名為「因由記」者頗為類似，不但同是以散句來記敘釋教因緣業報的故事，也不見有講說、吟唱的口吻或提示語，故筆者以為它應該也屬因由記一類的作品。而 P.3317 的〈佛本行集經第三卷已下緣起簡子目號〉所列的一百多則緣起目號，

其中有數十則與 S.3050V、S.4480V、S.3096 所敘的故事情節關目暗合。故我們應該可以為它起「佛本行集經因由記」這樣的題名。

至於 S.3050V、S.4480V、S.3096 除了抄錄〈佛本行集經因由記〉之外，也穿插有〈淨土法身讚〉、〈賽天王〉等文本，縱然各文本的字跡不大一樣，但，像這樣抄錄敘事文學作品的同時，也還抄了釋教的讚、願文，在敦煌文獻中並不算少見，包括：S.4654 在抄錄〈舜子變〉前，先寫錄了〈大乘淨土讚〉；P.3697 也是在抄錄〈捉季布傳文〉前，寫錄了〈大乘淨土讚〉；而 P.3645 則是在抄錄完〈前漢劉家太子傳〉、〈季布詩詠〉後，寫錄有〈佛母讚文〉；S.2204 也是先抄寫了〈董永變文〉，後頭接著是〈太子讚〉、〈十無常〉、〈父母恩重讚〉、〈十勸鉢禪關〉等贊頌文，較特別的，是〈太子讚〉所贊頌的內容和 S.3050V、S.4480V、S.3096 所敘故事有不少是相應的。這些都說明了敦煌敘事文學作品與讚文合抄在一塊絕非偶然，表示了它們與佛教俗講儀式是有密切的關係，也可以就是俗講儀式其中一環節——「便入經說緣喻了，便說念佛讚了，便施主各各發願了」的反映。